從香港新樞機看「中梵建交」前景

柯毅霖著　陳愛潔譯

教宗本篤十六世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宣佈任命香港教區陳日君主教爲樞機，消息佔了香港報章頭版和電視新聞好幾天。主要的傳媒機構派出記者前赴羅馬，又有約一百四十名香港教友隨陳主教到羅馬觀禮。這次傳媒爭相報導陳主教擢升樞機的消息，在回歸中國主權九年而又如此現代化和商業化的城市——香港，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香港是中國與西方之間的橋樑，天主教徒只佔人口百份之五。(編者按：原文如此。)從整體來看，天主教會是一個毫不重要的實質：對於一些居民來說，基督信仰是陌生和外來的東西。然而，由於陳主教參與社會，他已成爲香港最爲人認識、尊敬和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甚至獲選爲二零零二年的風雲人物，而且有很多人稱他爲香港的「道德良心」。

由於陳主教富抗爭性，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有好辯的風格，因此，他獲擢升樞機一事，已在教會內外讓很多人感到驚訝和好奇。有些觀察員認爲他「獲賞」樞機禮帽是太過具爭議性。事實上，有些人以爲他的角色會被削弱，而他本人更會調離香港。在某些人的眼中，陳主教經常嚴厲批評北京打

壓宗教自由，所以他被視爲教廷與北京政府復交的障礙。此外，由於他對香港政府持有好辯的風格，所以被稱爲反叛主教。

陳主教的公眾事務參與

爭取港人於內地出生子女「居港權」運動，是推使陳主教與政府衝突的首個重要議題。運動於一九九九年開始，其中一位較引人注目的領袖，就是宗座外方傳教會甘浩望神父。在許多不同的議題上，陳主教都採取堅定的、公開的立場。他探訪那些被捕並在獄中服刑的人，又爲那些參與絕食抗議、靜坐和示威的人打氣。他有時在公開的示威活動中發言。在香港絕少有一位宗教領袖如此大膽。

陳主教也在反對「國家安全法」立法的民衆運動中擔當卓越的角色。香港特區政府企圖藉立法而限制香港市民所享有的自由和公民權利。正如現時衆所周知的，有關法例在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的大遊行所顯示的「人民力量」下被迫撤回。

陳主教對香港的民主政治抱支持的立場，大多數市民亦支持民主，但遭北京政府阻礙和反對。

陳主教也在另一個重要的問題上反對政府：當局要爲新的教育條例立法，此舉將奪去天主教會對其三百間教區學校的管理權。有趣的是，歷史本身也眞的在重複。香港教區首任主教高主教，曾與（當時的英國）政府就公共教育的問題上發生激烈衝突。這些和其他問題已令陳主教與地方政府（香港）和中央政府（北京）對立，使他置身爭論的中心，甚至有很多人指責他是「政治」領袖，而不是宗教領袖。

陳主教的牧民熱誠

陳主教有一個十分堅強的牧民和社會精神。作爲慈幼會會祖聖鮑思高的忠實兒子，他優先看待受苦的人。他密切接觸德蘭修女創辦的仁愛傳教女修會，以及她們服務的邊緣人士；他花很多時間探訪監獄，關心很多獄中人士的情況，使信仰更接近他

們，也讓他們中的幾個人認識信仰。筆者有幸經常有機會與陳主教一起，見證他對衆多身處困境的人，尤其是對年輕人所表現出的愛心以及不爲人所注意的慷慨。陳主教熱愛正義，並曾經支持那些常常被所謂高尚人士所責難的人的理想。在他的指導下，香港教區正義和平委員會不但在香港，也在整個亞洲內，成爲其中最投身的、富有活力和勇敢的組織之一。

陳樞機與中國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其首次樞密會議上任命的十五位樞機當中，陳主教是最惹人注目的候選人。北京會有什麼反應？陳主教會否讓中梵雙方更接近，抑或加深彼此的隔閡？他將是問題的一部份抑或是解決方法？陳主教經已被禁止往中國，又不受政權歡迎，所以有很多人擔心他會製造更多障阻；他們認爲本篤十六世在這問題上或是沒有充份了解，或是消息不靈。

筆者個人十分喜愛這個選擇。筆者認爲教宗已作出一個宗教的、教會的選擇，當中沒有任何政治考慮因素。教會需要一位華人樞機。陳主教是必然的人選。他是香港教區的領袖，而這教區是世界上擁有最多華人司鐸、修會會士和教友的教區。陳樞機在上海出生和長大，他與當地仍保持密切的關係；他一生的大部份時間都在香港渡過；他曾任修院教授；慈幼會省會長；並能說多國語言。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比任何人更認識在中國的教會。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六年（當年他獲任命爲香港教區助理主教）期間，他每年都會花六個月的時間在中國境內各修院授課，這樣，他能夠直接認識國內的主教、神父、修會會士和教友。現時在中國晉牧的幾乎所有年青主教都曾是他的學生。

陳主教履行香港教區主教職務的同時，也一直清楚地捍衛中國教會，並爲中國教會發言，因爲中國的教會仍被迫保持緘默，也被剝奪自由。

陳樞機不但深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友歡迎

和愛戴，他亦成了他們的聲音。因此，這些年來，當局一直阻止陳主教回鄉（除了曾往上海作簡短的私人訪問和掃墓外）。陳主教擔當樞機的新角色後，現在有更多機會向教宗報告中國教會的情況。

因此，教宗已作出一個爲教會十分重要，亦表達出他關愛教會和華人的抉擇。把陳主教拒於新樞機名單之外，將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抉擇。這便會把教會的需要矮化爲外交方面的考慮因素。但是，在教會的傳教使命中，外交關係不是主要的；它只是其中一個工具而已。教宗本篤十六世按照自己的良心而作出自由的選擇。中國，或更好說是中國政府，需要嘗試接納教會是這樣子，即是自由的、獨立的、普世的；並非如它所想的，成了民族主義的工具、被屈服的和被約束的。

再者，近日有關外交關係的一些討論，並未切合傳揚福音的目標。中梵建交中所需要的是宗教自由，其中也必須包括傳教活動的自由。

在這些日子，正如大多數的香港市民一樣，筆者看那些在聖伯多祿廣場拍攝的、具吸引力的電視影像和報章上的彩色照片，展示教宗本篤十六世在聖伯多祿廣場舉行的隆重禮儀中擢升新樞機。筆者深入地想，這是一種福傳，或至少是一種接受福音的準備。在香港這樣的一個後現代的城市，具有最先進的傳播方法，這些影像是大部份人接近天主教信仰的唯一方法。這些影像也留下一個印象。去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逝世時，筆者便確定這一點。當時傳媒密切注意他去世的消息。他們敘述教宗的生平故事，又直播他的葬禮。人們都留下十分正面的印象，以致有些人主動認識天主教會，並參加慕道班。因此，今年領洗的人數明顯比平常的多。

筆者也知道，就公衆輿論而論，陳樞機的社會及公民參與已令人們對教會感興趣和喜歡，也有一些人更走近信仰。

因此，筆者認爲香港主教獲擢升爲樞機，在其他任何考慮因素之前，爲傳揚福音而言，是天主賜予的禮物，是上主眷顧的機會。□